

邵钰文存

1

松筠展读集

邵钰
●
著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1

松筠展读集

邵钰●著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筠展读集 / 邵钰著.——上海: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0.5

(邵钰文存)

ISBN 978-7-5072-1580-9

I. ①松… II. ①邵…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659 号

邵钰文存(一)松筠展读集

邵钰著

责任编辑 郑晓方

装帧设计 柯国富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电 话 021-64373790

传 真 021-64335603

电子信箱 cwiph@126.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湖州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2-1580-9/C·1

定价 60.00 元(全三册)

前 言

民国时期,陈其美(字英士)在他的家乡湖州享有崇高的荣誉。这里有他国葬规格的庄严陵墓。我们童年时,每年清明前后,学校都要组织学生远足(郊游)到南郊的英士坟去,纪念这位本乡的辛亥革命先烈。抗战时期的吴兴县立战时中学校歌中颂扬“安定遗风英士泽,今古辉光”(“安定”指北宋在湖州创立湖学的教育家胡瑗)。湖州还有英士街、英士中学;杭州有英士衣冠冢,西湖边有英士铜像;金华有英士大学。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见到的有虹口的其美路、贵州路的英士纪念堂(湖社)。我因参加学生反美反蒋运动,列入特务机关“黑名单”被迫离开大学,曾在湖州旅沪中学执教。每年都要带学生去湖社参观几次,那里经常展出陈英士生平事迹和殉难时的血衣等实物,我依然对这位为共和革命献身的同乡先烈深为崇敬,认为这是有志于社会变革的青年的学习榜样。

然而,弄不懂的是,在孙中山被我们尊为“革命的先行者”的同时,这位紧跟孙中山进行共和革命,备受孙中山赞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就为共和革命牺牲的陈其美,却被戴上一连串吓人的帽子,打人另册。“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以“戴帽”之身破帽遮颜回到家乡,听说“红卫兵”正在“砸烂”英士墓,与陈家有亲戚关系的人日子都不大好过。我因插队下乡,谋生不暇,当然不敢去打听这些事。

上世纪 70 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春风劲吹,我像出土文物似的重见阳光。1981 年夏,我在美国的表侄,也是陈家的至亲,首次回乡探亲,他知道英士墓不存在了,没有去扫墓。不久,中央拨款重修英士墓了。1984 年陵墓的主体工程告成,我便拍了一些照片寄去,反应很好。1986 年,为了纪念陈英士殉难 70 周年,湖州市政协、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共湖州市委统战部、湖州市社科联五单位联合发起在湖州举行陈英士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的首次。湖州历经各种政治运动“横扫”,有关陈英士的资料荡然无存;历次政治运动中与“四大家族”有关的人员多受株连追究,某一职工说了一句“陈英士没有反共”竟被判刑十年。人们不敢“触雷”,所以也缺乏研究陈英士的专业学者。但讨论会上不能没有东道主代表的学术性发言,市社科联的负责人找到我这个“廖化”,说我有“海外关系”,可以找到资料,勉为其难吧。我通报海外,果然反应强烈,立即邮来了一批资料。我得以凑成第一篇文字《历史地评价陈英士》,参加了讨论会并在会上发了言。

更重要的是我在会上聆听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珠玑发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沈阳、福州等包括浙江的九省市研究机构或高校的专家,还有辛亥志士的后裔章念驰、王小安、李赣骝等。那时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如现在,有些学者,如上海的唐振常,沈阳的赵矢元指名道姓,语出惊人,有理有据,令人振奋。但省历史研究所的同志私下也告诉我,在省里争取为陈英士开学术讨论会很不容易,其中颇有历史、人事、地域积怨的纠葛。这何尝不是影响对陈英士正确评价的重要因素。

以后,我较长时间在从事地方文史的整理研究和编地方志,也应约写些地方人物的论述或资料。接触的史料多了,从纵

横两方面即时代和环境来考虑人物性格、言行形成的想法也多了。特别对现当代的人和事,我们似乎还处于当局者迷的迷惘状态,现在就匆忙地撇开时代环境因素,贴标签式地判定个人的正反、功过、是非,意义并不大。我们的责任是利用比较知情的优势,尽可能避免道听途说和主观的臆造歪曲,尽可能还历史以真实。再者,历史学界的时空概念常是宏观的。我曾从事新闻工作,往往在意细节的时空背景。相似的人物和事件,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前或之后,有一年、一月、一日甚至同一天的白天黑夜之差;出现在国内或国外,南方或北方,北京或上海,租界内或租界外,甚至房内或屋外之别,其起因、意义、产生的后果和评价都会截然不同,能不慎哉!

还有一篇分量较重、脱稿于2000年底的《吴兴陈氏》是应某团体编撰太湖沿岸望族一书的命题撰文。在三四十年前的大陆公开撰写类似文稿是不可想象的。经过时间老人的冲刷,国共两党之间的分合积怨逐渐淡化,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声又响了多年,才有可能把陈氏列为望族,从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撰述。经与同道们商量,初步定下的基调是要海峡两岸的人们都能接受,即严格尊重事实,功与过都不夸张、掩饰、含糊,用中性语言表述。写成后请了解情况的耆老过目。最近有陈氏亲属从海外来,又进行若干补充。写稿过程中,从我接触的老人(有的是离休老干部)中也听到不同的声音。有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的说你怎么敢写这个?有的好心地说以后不要再写了;也有比较了解湖州陈家家产情况的,说陈家民国高官不少,号称“四大家族”之一,是反共罪魁,却都不乱捞财物,清廉持家,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出来。

戴在陈英士头上的帽子主要有:江浙财阀代表、反共老手、流氓头子,以及“杨梅都督”等流言,书中各文已作辩解,不必再

重复。但有几个问题,还需要综合提一下。

影响对陈英士评价较大的,根子还在对辛亥革命的整体评价。几十年来,人们常以工农或无产阶级革命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高标准,去衡量历史上反奴隶制、反封建革命的得失,常指责资产阶级革命的“反人民”、“与封建主妥协”、“表现了阶级局限性”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力革命阶段,曾将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又不代表先进文化的太平军运动和义和团捧得很高;而对适应生产力发展、旨在变革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解放现代工农业生产力的辛亥革命,却因为是后来沦为反动派的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所发动的,横挑鼻子竖挑眼,贬多于褒。近年史学者们的态度已有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今年出版的文集《历史并不遥远》中是这样论定的: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卖国、独裁、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民主革命的重要里程碑》)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运动中,不少革命党人,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擢功名利禄于度外,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对于今天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仍然是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献身精神》)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充分肯定。但至今还流行这样的说法: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反封建斗争是“失败”的。实际上,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很孱弱,且多

集中于沿海(江)少数有租界的较开放的商埠,大多受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控制,还不具备领导革命的力量和意识。革命的实际领导层是接受了国外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熏陶的归国留学生、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目标是推翻封建帝王专制,建立共和政治制度,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革命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和海外华侨资产阶级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正确的。他们面对的除了腐朽的封建王朝以外,还有封建王朝豢养的、势力稳固得多、貌似新潮的军阀集团(其中也有分化)。知识分子革命领导层既无与军阀抗衡的武装力量,政治上又十分幼稚。一度为革命出力、封建意识极严重的会党反复无常,消极面渐次暴露。在临时共和政府成立之初,有些人以为大功告成,章太炎扬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与立宪派张謇等另组政党准备参加议会政治了;宋教仁专心投身于议会和组阁执政;孙中山也一度想脱身去实施他的实业计划梦想,把好不容易争得的政权拱手让给野心勃勃、靠出卖国家主权养肥的头号军阀袁世凯。不久宋教仁遭暗杀,袁世凯对国民党步步紧逼,革命党人才猛然惊醒,匆忙发动“二次革命”,又失败了。国内资产阶级力量比较集中的上海及长三角,可称“财阀”的盛宣怀、张謇原是不赞成革命的君主立宪派;上海光复时积极支持革命的资本家,在“二次革命”时大部分转为消极甚至反对武力斗争。而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流亡海外仍然奋斗不止。孙中山、陈英士等为了整肃革命党内部,精练力量、统一意志,成立中华革命党(它存在封建会党恶习令人遗憾,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它的正面目标和作用),继续发动武装起义,又经受了新的残酷的斗争煎熬。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孱弱幼稚是合适的,连孙中山都一概责为“软弱”恐怕有失公允。

辛亥革命无疑是从封建帝制向共和政体的一次飞跃、质

变,但反封建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期待着主要是生产力的长期量变过程,积累为新的质变。孙中山等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梦想,来不及实现,也没有实施的具体计划和措施。紧接其后的是封建性极强的较长时期的军阀混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对象演变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即使在新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挖了封建制度老根以后,封建意识、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到处可见。反封建既是一个长期任务,我们又何必厚责前人?

陈英士与会党的关系,我在《陈英士和会党》中从会党不等于流氓,辛亥革命中会党曾起了很大作用出发,做了初步阐述。近读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在该书的 434 页上对此做了如下论述:

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前后与青洪帮的关系密切,得到过帮会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一批青洪帮人物在沪军都督府中也参与军政。但陈其美本人在组织上并未参加过青帮组织,进入民国后为了巩固上海的革命政权还对帮会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试图加以改造。

这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市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位作者是华东师大的历史学硕士、历史系副教授;而且他们是在已故导师魏建猷教授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又研读大量史料后撰写的严肃学术著作,是可以信赖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特定环境中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如沪军都督任上处决镇军参谋陶骏保、都督府书记余漱芳、逮捕前大清银行经理宋汉章等,不能都扯到“流氓作风”上去。其他小说家之言、街谈巷议、缺乏事实佐证的流言蜚语,更不能未经考辨即轻易采信。

十几年来,写下这些浅薄的论述和史料。由于年龄和精力

的限制,眼昏手颤,再要去孵图书馆、档案馆收集、钻研分析资料、重加整理,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自问写作这些旧文字时力求客观公正,且有忝为湖州人、与陈氏有瓜葛亲、涉猎地方文史尚多、曾居上海等优势,但反过来这又成为囿于桑梓、地域陋闻的局限,所述有欠广远,只能供同道参考。承蒙湖州陈英士研究会和徐重庆、王增清等同道的支持,辑成这个小册子。其余论述基本上按时序安排。后面是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湖州籍人物介绍(已有传记问世的如张静江、戴季陶等不重复),还有些可帮助了解辛亥革命背景的其他论述和资料。为了不掩饰作者认识的曲折过程,昔日所作除了略删去已证明错讹的论据外,对尚存疑问或略有重复之处,一仍其旧,基本不作修改。对文字落地后新发生而必须补充的事情,则以按语形式补缀。最后,还附录了陈英士关键时期的一些函电文告,以备评考。

目 录

前言

瑜瑾长无点 松筠自有操

——辛亥革命时代的陈英士 (1)

历史地评价陈英士 (21)

陈英士遭贬斥的症结何在 (30)

湖州望族之一——吴兴陈氏 (33)

陈英士和会党 (68)

附：《中国帮会史》评述陈英士与帮会的片断节录 (77)

陈英士的上海住所 (86)

陈英士试建航空队 (90)

沪宁铁路运兵 (93)

陈英士和袁世凯的会面 (97)

同盟会中的湖州人 (102)

光复上海中的湖州人 (109)

湖州人在上海的同乡组织 (117)

钱恂 (126)

沈翔云 (129)

王一亭 (132)

朱家骅和“抗英敢死团” (137)

姚勇忱 (140)

俞寰澄	(143)
沈联芳	(146)
凌铭之和唐乃康	(149)
徐森玉“孤岛”救藏书	(154)
脱离军界的陈其采	(157)

附录

陈英士重要函电	(162)
三本陈英士诛郑讨袁(牌子曲)	(185)
孙中山、唐绍仪请国葬陈英士函并给各分支部通告	(189)

瑜瑾长无点 松筠自有操

——辛亥革命时代的陈英士

近年来学术界对历史人物、尤其是近代人物的研究齐放争鸣,仁智互见,这是非常可喜的迹象。如果都本着从史实出发、不掺杂个人好恶或地域族群偏见、不脱离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而苛求古人,尽量避免蓄意土偶敷金,佛头着粪,可以愈辩愈接近于真实。

几十年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辛亥革命时代的人物贬多于褒,轻易斥之为假革命、投降、妥协、投机,多数辛亥人物的历史贡献往往被全盘否定。此种现象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如对于辛亥时期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英士),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列了他的史迹;中央拨款在他的家乡湖州重修陵墓;上海、杭州正易地重树铜像;举行学术讨论会,出版有关书籍。近读《书屋》2004年第5期黄波先生大作《说到“英雄”一涕然——陈其美及其时代》,我很欣赏其研究态度。由于掌握的史料和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也愿以“瓦釜之鸣”求正于黄先生。本文文题来自章太炎为陈其美作的挽联。为了更强调时代的作用,我将黄文的副题文字掉转而用之。

辛亥革命与会党

建国以来,对陈其美的评价是某些近代史权威定格的“反

共老手、流氓头子”。这不仅是戴顶“帽子”，上世纪 60 年代湖州就有人因说陈英士没有反共而被判刑十年；上海、浙江各地，凡是冠以其美或英士的地名、路名、大中小学校名一律更名，各地的英士纪念堂被废，上海外滩、杭州西湖边的铜像被毁；“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州国葬规格的陈英士陵墓被“红卫兵”砸棺曝尸，夷为荒坡，几近灭迹。

而究其实，陈其美 1916 年 5 月被刺杀时俄国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中国当然还没有共产党，他怎么反得着“共”？反共的是他的盟弟蒋介石和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是在 1925 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怎能让已去世十余年的盟兄、叔叔承担罪责？

关于“流氓头子”，拙作《陈英士和会党》已多方举例予以批驳，不必重复。这关联到对辛亥革命中的会党如何评价的问题，还须结合时代特点稍说几句。

史学界多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远未具备进行革命的实力。在积淀了几千年帝王专制统治经验的清王朝统治下，根本没有西方政党（顺便说说，西方政党也有如美国党员自由结合、组织不固定的共和、民主党，以及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党，不能一概而论）进行合法活动的空间，只能靠枪杆子说话。发动武装革命的主要力量有三：以留学生为主的具有共和革命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是领导层；有反清复明渊源或太平军运动遗留的会党几近主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接受了部分新思想的新军是主要争取力量。只有少数地区如上海，才有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参加了革命行动。三种力量中，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会党力量最大，它较适应当时社会意识和生存环境，网络遍及城乡，并且渗透在各类武装力量之中。没有武装力量依靠的新型知识分子要发动反清起义，联

络会党是唯一捷径。辛亥革命团体如同盟会、光复会等,从不避讳他们和会党的关系,读老同盟会员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便可了然于目。如同盟会入会的盟书上所用的“天运”年号便是明亡后天地、哥老、三合等秘密会党所沿用的(《革命逸史》第三集201页)。直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会党也曾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有史可证的。将会党中人一律斥之为“流氓”是违反历史真实的。

辛亥革命推翻延续几千年的帝王专制政治是不可否认的伟大历史功绩。革命成功不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倒退反弹,立即在万人唾骂声中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可见共和革命正面影响的深远。辛亥革命也在汲取西方现代文明上为倡导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开拓了道路,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因素的存在。由于当时的革命党保留着许多封建会党的印记和陋习,如拉山头、抢地盘、搞暗杀,党魁独裁、等级森严,重破坏、轻建设,在革命过程中排斥异己、相互攻讦甚至错杀同道,形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憾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改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宣誓忠于党魁个人,在誓书上按手印,也是会党意识的反映。这主要应归咎于革命者的时代局限,过分深究个人责任意义并不太大。

上海光复中的资产阶级

前面已经提及,上海是辛亥革命中少数有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参加行动的地区,这是因为上海资产阶级力量比较集中和壮大。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11年前后,全国厂矿549家中,上海有83家,资本额占全国的20%;纺织厂、丝厂上海及江浙占全国的80%、90%,外贸上海港占全国总值的44.2%,经济影响更大的金融。光绪九年(1883)“红顶商人”胡

雪岩破产，他在上海的阜康等钱庄接连倒闭，波及北京的“恭邸（恭亲王）、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李慈铭《越缦堂日记》）。1910年7月因澳大利亚商人诈骗而引起的“橡皮股票风潮”，几近罢市，惊动了两江总督出面向外国银行借款以挽救市面危局。1911年秋即武昌起义前后，合肥李氏家族在上海的义善源总票号破产，波及大批钱庄倒闭，四明、兴业、信成三家银行“公议暂闭七天”。这也是促成工商业者倾向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上海钱庄史料》）。

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壮大，1904年上海等地开始成立商会并且逐渐控制了有革新意义的市政管理。清政府筹备立宪，上海姚文楠等便组成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设户政、警政、工政三科，把电灯公司、城门马路、自来水公司、政法讲习所和平糶、平价、禁烟等都管起来了。1909年清政府颁发城乡自治章程，总工程师局改称自治公所，职权进一步扩大。上海工商界的武装力量始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先是成立体操会进行体育训练和兵式操练。1907年，革命党人在广西、安徽连续发动起义，长江中下游动荡，总工程师局负责人李平书、曾铸等以“五体育会”为基础组成临时商团，“设司令部，分区驻扎，出队梭巡，历三昼夜，地方安谧”（《上海县续志·商团》）。上海道为其拨给步枪150支，商团又陆续自购了不少枪械。以后，城厢、闸北各行业也纷纷建立商团，其成员都是商人、雇员及其子弟，服装齐整，操练有序。上海光复前后已超过2000人，是不可忽视的准军事力量。

所以，上海资产阶级的向背是当地革命运动成败的关键。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之一便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支持甚至反对。陈其美之所以能当都督，首先是由于他具有中



沪军都督陈其美

部同盟会负责人的身份,在上海光复前已为支持武昌起义和组织各地尤其宁、杭起义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其次,他得到上海资产阶级的信赖和支持(他是资产阶级组织国民总会的调查部长);再次,本人是报人,又参加南社,在知识界有一定声誉;因而他能够通过革命党人、工商界和会党掌握上海军、警、商团及其他社会武装力量;另外,他还有单身闯入制造局形成的英雄形象。而李燮和刚从湖北

派来,只掌握了闸北、吴淞光复会控制的部分湘籍军警力量,虽然在武装起义中立下不朽功勋,但没有得到工商界的充分支持,即使当上都督也很难开展工作,这不是靠刘福彪手枪拍桌子所能决定的。关于推选都督另外有来自同盟会方面的版本:“(11月6日)前两天推举出来的都督李燮和,因为人地生疏,一筹莫展,早已躲到租界上去了”(黄兴之子黄一欧《辛亥沪宁光复的片段回忆》);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集《光复军司令李燮和》也有“各防军初推燮和为都督……后以燮和与其美意见不合,绅商各界多属意其美……燮和乃让都督于其美”的记载,这恐怕不全属空穴来风。

沪军都督府的作为

近年研究陈其美的重点多落在为其正名等方面,对沪军都